

欧 洲 观 察

2012 年第 2 期·总第 81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2 年 2 月 1 日

本期导读

1. 论跨文化理解困境类型 ——以中德两国的文化行为比较为例 王志强
2. 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 ——2011 年学术年会综述 杨海峰
3. 简讯
4. 欧洲动态（2012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 月 31 日）

学术探讨

论跨文化理解困境类型 ——以中德两国的文化行为比较为例

王志强¹

[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的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都基于跨文化沟通的正面性，但是综观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实践，人们不难看到，各种文化间存在着彼此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在了解他我文化，并已具备文化认知前提和跨文化接受条件时，依然会遇到问题和困境。本文从跨文化认知特性出发，对由此所形成的跨文化理解困境进行探讨，确定三大类型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不同文化的成员如何进行交流，跨文化沟通怎样进行，这构成了本文作者近年来对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出发点。在先后已刊的论文²中，本文作者着重探讨了跨文化沟通理论构建的前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文化异同性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诠释学视角界定了文化异同性概念和互动认知基本范畴，并提出了本我对他我理解的结果是本我借助他我对本我的反射，将跨文化沟通确定为本我和他我互动理解和互动认知过程。作为文化载体，参与跨文化沟通双方都受到其特有的文化视角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通常会以本我视角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和对待对方，由此产生的对他我文化的理解，实质是本我对他我反观的结果。因为，被理解的“他我”并非客观的“他我”，而是在同“本我”产生互动过程后，反观“本我”后理解的“他我”。鉴于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这一认知特性，本文作者提出要从他我视角去审视“他我”，或用第三只眼，即从介于本我和他我的第三视角去看“他我”，以此缓解跨文化理解本我认知主导性。

¹ 王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本文已刊登在《德国研究》2011 年第 3 期上。

² 参见王志强：《本我和他我——跨文化日耳曼学视角下文化异同认知互动性》，载《德国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64-70 页；《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例》，《德国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71-76 页；《跨文化诠释学视角下的跨文化接受：文化认知形式和认知假设》，载《德国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47-54 页。

在第二阶段,本文作者的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面向跨文化接受,基于“本我”和“他我”跨文化理解互动认知性,论述了跨文化接受的三个阶段,即1、对他我文化在视觉等方面的印象的跨文化感知;2、对以有形为主的文化现象深度感知的跨文化体验;3、关注他我文化文化背景和深层次因素、在他我文化背景下对他我文化进行深度理解的跨文化理解,并认为由此奠定的跨文化接受具有认知互动性和辩证性,即在对他我理解和接受过程中达到本我理解、本我认知和本我启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接受认知假设,人的文化整体性、客观和主观假设和理解形式也决定跨文化接受形式的选项和接受的程度。

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的第三阶段,是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跨文化理解困境。迄今为止的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都基于跨文化沟通的正面意义,即通过沟通能够达到互相理解,能够解决不同文明间和不同文化人员间的冲突。但是综观经济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实践,人们不难看到,各种文化间除了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接受和认可的内容和因素层面外,显然还存在着彼此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在了解他我文化,并已具备文化认知前提和跨文化接受条件时,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不能实现沟通,依然会遇到跨文化问题和跨文化理解困境,而这已不完全是沟通本身的问题了。其背后的障碍是什么,有哪些制约因素,它们如何影响和阻碍跨文化沟通,是本文作者对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第三阶段的研究出发点。本文将在对跨文化认知特性界定的基础上,分析跨文化理解困境的三种类型(客观困境、互动认知困境和主观困境),提出若干应对思考。

一、跨文化认知特性

跨文化理解是本我和他我的互动认知过程。基于这一跨文化理解假设,跨文化认知特性涵盖文化和文化互动性这两个层面,它们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化的人员间的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沟通。

1、文化认知特性

从文化自身特性看,它受地点、时间和文化载体的制约。因地点、时间和文化载体的不同,各国文化具有其相对的不同性,这不仅涉及文化形态,也包括文化价值、文化行为期待和文化模式以及思维习惯等等。由此形成的文化特殊性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行为取向,并成为人们对他我文化理解的认知方式和行为反应方式的出发点。在这方面,本我文化认知特性是每一种文化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物自体属性,而这种文化物自体属性又是各民族在特定文化时空、由这一民族文化载体奠定的文化自我特性,它独立于他我文化而存在,并反映这一民族特有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这种文化物自体属性也反映了特定民族国家的特性,由此奠定的文化核心价值标准决定人们的感知、思维、判断和行为以及情感表达方式。

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在文化物自体层面,个人与(本我)文化有着互动辩证关系³,其社会行为受到文化物自体属性的影响,在这方面,个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模式主导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并成为人们对他我文化评价的出发点。通过个人社会化和文化社会化过程和途径,使人与文化建立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奠定人的文化整体性。人的文化整体性包括文化认同、阶层认同和个人社会化,也包括个人教育社会化过程。文化认同涉及文化宏观和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文化是群体、个人和机构和民族的主要取向体系和文化行为取向体系;在微观层面,文化影响人们的感知、思维、评价和行为和学习方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归属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主流文化的社会行为期待,⁴这受到个人特有的社会化和个人经历影响,在此过程中宏观文化价值和社会文化行为期待内化为个人文

³ Klaus P.Hansen, *Kul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 3. Auflage, Tübingen und Basel: A.Francke Verlag, 2003, S.390.

⁴ Siegfried J. Schmidt, „Kultur als Programm und Modi von Kulturalität“, in Siegfried J. Schmidt (Hrsg.), *Interkulturalität Theorie und Praxis Deutschland und Korea*, Münster: LIT Verlag, 2004, S.3-17, hier S. 10.

化行为和文化行为反应的出发点,⁵ 并影响人们对待他我文化的态度和方式,在这方面,“理解总是同理解者的立场和视角紧紧结合在一起。”⁶

2. 文化互动认知特性

基于文化认知特性的跨文化理解具有文化互动认知特点,它一直处于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在跨文化认知层面,文化具有“物自体属性”(Kultur an sich)和“物他体属性”(Kultur für sich)两个层面。文化物自体属性是文化载体的本我文化属性,构成文化自身特性;文化的物他体属性是本我文化与他我文化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属性。跨文化理解可被看作是一种本我和他我关系奠定的过程,是本我对他我解读的表述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我和他我的认知互动性,这种关系也制约文化互动理解。

如果我们将跨文化理解看作是跨文化互动和交际过程的结果,那么,跨文化认知必然有其特有的文化互动认知特性。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文化自身特点、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点和不同性得到确定和界定,在这一“文化互动诠释观”⁷和文化互动认知假设下,跨文化理解由于是本我和他我的互动认知过程,因而具有比较认知特性和互动界定特性。基于这一认知假设,“文化被看作是互动、交际或话语交换过程,因而对文化(或文化特性以及特定文化行为)的界定不可避免地具有互动特性。(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现实性是指文化实践、或是语言区别以及互动过程的结果。……即便是对一文化因素最随意的界定和描写也是以互动性和互动过程为前提的”⁸。在这方面,“每一种他我文化认知离不开同本我文化的区别性界定。”⁹语言、跨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认知心理等深层次隐性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跨文化沟通互动过程。文化间在社会习惯、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和不同性也影响和阻碍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沟通,并带来跨文化理解困境。¹⁰另外,作为文化载体,个人对他我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也决定文化互动关系的建构,在个人对他我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具有排他性时,跨文化理解会面临不可逾越的主观困境和跨文化冲突。

二、跨文化理解困境类型

如上文所述,在跨文化特定认知情况下,文化自身特性和文化互动认知特性会带来多维度的跨文化理解困境。就跨文化沟通实践和跨文化认知性而言,跨文化理解困境涉及客观内容、互动认知习惯和个人主观文化态度层面,由此形成客观困境、互动认知困境和主观困境三种困境类型。客观困境涉及文化自身特有的、不可逾越的文化底线,在不了解、不尊重和不宽容这一文化底线时,客观困境会阻碍跨文化沟通,相反,在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彼此宽容和彼此接受的前提下,这一客观困境不全会影响彼此沟通理解。互动认知困境则产生于文化互动认知过程中,它基于本我文化理解方式和认知习惯,在不了解他我文化背景下,从本我视角去审视和对待他我文化,从而产生跨文化沟通困境。跨文化主观困境涉及个人排他性文化立场,在这一情况下,即便人们努力去理解对方,也不能达到彼此间的跨文化沟通。

1、客观困境

跨文化理解的客观困境由文化间的差异性和不同性所致,它受到自身文化物自体属性和国家特殊性制约,独立于主观意愿而存在。在深层意义上,“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

⁵ 王志强:《本我和他我——跨文化日耳曼学视角下文化异同认知互动性》,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2期,第64-70页。

⁶ Ronald Kurt, *Hermeneutik ein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Einführung*, Konstanz: 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2004, S.9.

⁷ Jürgen Straub, „Kultur“, in Jürgen Straub /Arne Weidemann und Doris Weidemann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mpetenz Grundbegriffe – Theorien-Anwendungsfelder*, Stuttgart.Weimar:J.B. Metzlerverlag, 2007, S.7-24, hier S.18.

⁸ Ebd. hier S.17-18.

⁹ Ebd.S.18.

¹⁰ Ebd.

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长时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¹¹因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进程各文化形成了特有的核心价值、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以及文化禁忌。对某一文化而言，其核心价值和禁忌领域涉及其自身不可改变的文化核心和不可逾越的文化底线，因此，它在同他我文化成员的沟通中，在客观上就限制了跨文化的沟通。

纵观中西文化，人们不难看出，它们都有着因其特有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致的特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就中国文化价值形成的历史而言，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以家庭、家族、宗族为主，这同我们的祖先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农耕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农业活动中，以血缘纽带为主的集体理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和群体人际关系行为取向体系和社会行为要求。基于“和”这一终极目标和终极价值，中国传统社会推崇“和谐中道”和“和而不同”理念，“和谐中道”不是消极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以达到“和而不同”。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群体性、等级性和礼治性成为达到“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终极目标，实现社会稳定、和睦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群体性”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人们强调“我们”和“大家”，忌讳“我”和“小家”；强调“求同”，恪守孝道和孝亲，¹²维护与“我”有关系的血缘关系；强调缘分，在群体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地位，拓展人际关系，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要求人们重家庭，重血缘，重辈分，重关系，重人脉，家庭利益和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群体性”取向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朋友、同事乃至整个国家”¹³，形成了个人、家庭和国家的上下互动关系，这种以家庭为出发点的群体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的儒家生命观，“个人的生命是父母所生的，个人的生命是历代祖先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整个家族的生命应当构成一个延绵不断的整体，”¹⁴，人们将家庭视为“大我”，倾向于把家庭看作是一个整体。¹⁵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重关系和集体主义受到等级和礼治制约，中国文化又一核心价值等级观要求人们认同等级，强调辈分和上下社会关系，以此建构社会秩序。“礼治性”和“礼”文化维系由儒家人伦道德奠定的关系主义，“规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¹⁶。由此衍生的文化行为取向标准，如中庸、面子观（脸面观），等级（权威）取向，秩序意识，社会制裁意识以及礼仪观和好客等，依然主导现代中国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从政治层面讲，以中国文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不可能一样。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格局¹⁷，也被称为熟人社会，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它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从个体出发，由道德维系：一条通往亲属，由孝悌维系；一条通往朋友，由忠信维系。熟人社会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等级特征。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熟人社会正向生人社会、有单位人向社会人演进。这一社会关系转型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传统中国社会熟人关系文化观，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关系取向和熟人关系性将依然主导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

不同于传统中国，“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

¹¹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¹² 杨丹荷：《我们为什么应该孝顺父母？》，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第15版。

¹³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130页。

¹⁴ 黄光国：《华人社会中的脸面与沟通行动》，载黄光国等：《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版，第127-154页，这里第138页。

¹⁵ 同上，第139页。

¹⁶ 同上，第132页。

¹⁷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0、32页。

较淡薄的社会”¹⁸，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个人为基础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在经过数千年的文化历史发展，个人自由成为西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终极价值和终极目标。个体性、平等性和法治性构成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三个核心价值。不同于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西方社会以个体为主，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以平等为取向，个人间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则由法治进行调节。人们认同个人主义，在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理性自由、个人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被人们所接受，成为西方社会主导政治文化价值。基于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这一西方核心价值，法律成为外在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人们重“合法性”，轻“合理性”。西方文化如此恪守个人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的生命观。按照基督教教义，个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由此奠定的西方个人主义核心价值主导现代西方人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和其行为方式。在社会中，人们勇于竞争，不怕冲突，追求个人权益，在这方面缺少“和谐中道”这一中国人理念。

由此奠定的中西文化价值和由此奠定的文化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或对立性。这方面以德文化行为为例，对它们在事情取向与人事取向，直接性/明确性与间接性/模糊性、重制度与灵活性、公私区分于公私混合、强时间观与弱时间观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德文化行为取向的不同性层面¹⁹进行比较；

事情取向与人事取向：在为人处世和事情处理方法上，德国人倾向于“就事论事”的态度，关注事情本身，注重理性，反对个人情感介入处事过程，排斥与事情不相关的其他因素。这种以事情为出发点的行为方式也涉及德国人对批评和争论的反应方式。对他们来说，批评和争论旨在澄清事情原委；对冲突也有积极的看法，认为涉及事情，并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则在处理事情的方式在很多场合会先考虑同事情相关的人际因素，这种以人际为出发点的处事方式也影响人们对批评的态度，人们避免批评和过激的言辞和人际冲突，认为这有伤人际情感，而且也会带来社会制裁。

直接性/明确性与间接性/模糊性：以事情取向也奠定了德国人行为的直接性和明确性，人们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种“直接性”既是德国人务实和重效率的体现，也被看作是诚实坦荡的表现，它要求人们言行一致和表里一致。同德国人相比，在行为反应和交际方式上中国人更倾向于间接性和模糊性，人们通过含蓄和委婉的方式和迂回策略，间接地表述个人的想法；在话语方面给己留有余地，也给他人留有余地。这种中国式行为方式虽然可以使人避免人际冲突，保护双方的脸面，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和睦，但是让德国人感到捉摸不透和不安，因为在他们眼里，在模糊性、间接性和不透明性行为背后似乎隐藏着“不良的动机”。对中国人而言，德国人的直接性行为方式和人际处事方式具有挑战性和冲突性，在很多场合会让人不能接受。

重制度与灵活性：德国人重规章制度，主张按规矩做事，并将之视为不可逾越的“天理”，在这一制度理念下，人们会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履行规章制度，反对制度外的随意变化。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更注重处事的灵活性，反对过度拘泥于制度，会因时、因地、因势和因人进行决策，对待相关制度和规定。这种灵活性处事方式和灵活性决策方式和对制度和规范方式让德国人感到同中方合作缺少可预测性和把握性。

公私区分于公私混合：德国人格外区别工作与生活，关注职业角色和工作岗位要求范围

¹⁸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74页。

¹⁹ Vgl. Sylvia Schroll-Machl, „Deutschland“, in Alexander Thomas etc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d.2 Länder,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 Tätigk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mbH & CO. KG, 2003, S.72-89; Liang Yong/Stefan Kammhuber, „Ostasien, China“, in Alexander Thomas etc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d.2 Länder,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 Tätigk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mbH & CO. KG, 2003, S.171-185.

内的任务，在工作时工作优先，工作以外的个人事宜“退居二线”。对他们来说，工作时只是工作，在工作外的时间尽情生活和娱乐。不同于德国人，中国人倾向于公私混合，这也影响人们的职业行为，公共行为方式，如在工作时会让人私事介入，人们不分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这也反应在中国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和同事交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工作中进行私人化和生活化交谈和交往被视为友好的表现，但这有悖于德国人的公私区分和工作观念，因为在他们眼里，这种公私混合的同事关系处理方式会带来职责混合，这最终会影响工作效率。

强时间观与弱时间观：对德国人来说，强时间观是有效行为和有效处事的前提。基于对时间的这种认知，人们对时间作出周密、细致的安排，按照日期计划生活和处事，恪守约定时间和时间安排，并将之作为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可信度及社会形象的重要标准。同德国人相比，在时间观方面，中国人更多倾向于灵活和模糊的时间观和不受时间的约束。

上文所述的中德两国人们的行为对比论述虽然只涉及几个层面，但让人看到，双方的行为有着差异性和对峙性，这在很多方面虽然成为中德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客观困境，但这不能阻碍中德双方的跨文化交流，其前提是：只要彼此了解和尊重各自文化特殊性和文化行为特殊性，在他我文化背景下理解对方，不强行让对方接受或实践本我文化核心价值，对文化不同性和特殊性给予宽容和包容，中西跨文化沟通还是可以实现，在这方面，“宽容是相互容纳差异性，包容则意味着不同文化与文明在合理的跨文化交往中相互理解并吸收他者的长处”²⁰。只要一方不突破他我文化价值底线，跨文化理解的客观困境就不会带来跨文化问题。另外，个人的文化属性主导人们对他我文化的认知方式，特别在对他我文化缺少客观了解的情况下，会无意识陷入基于本我文化逻辑的跨文化理解的客观困境和跨文化误解。

2 互动认知困境

互动认知困境形成于文化互动认知过程。在文化处于“物自体属性”状态时，在同一文化圈内，文化成员在本我文化层面，按照本我文化习惯和处事方式彼此交往，这不会带来跨文化问题。在跨文化沟通中，本我文化和他我文化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文化的关系性属性。在同他我文化人员交往中，在缺乏对他我文化了解的情况下，人们容易从本我文化释义模式、价值观出发感知和理解他我文化，将本我文化模式和文化期待套用到他我文化，或进行注入式的解读和理解，²¹在此层面上进行的跨文化理解与其说是他我文化理解，不如说是基于本我文化对他我文化理解的结果，是本我和他我在跨文化交际中互动界定的结果，这也影响中德的跨文化交际，如下文所述的一些中德跨文化交际实例所示，许多跨文化沟通问题在很多方面是源于本我文化观念的互动认知方式和互动理解习惯：

如碰到中国人好客，不时地为客人夹菜，这会让德国人感到进退两难，在过度情况下会遭到拒绝，因为，在德国人眼里，这种中国式为客人不断夹菜餐桌行为方式会使人感到个人选择自由受到限制，这也有悖于人们习惯的卫生观念。在送礼方面，德国人送礼不在乎礼品的价值，而较多注重送礼形式；中国人送礼则较为偏重于礼品的价值。在这一送礼观下，德式送礼方式在中国有时会让人觉得不够意思，不大方，甚至有点吝啬；而对于中国人过重的送礼行为，德国人会以为另有企图，因而对之格外谨慎。另外，礼物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是每个民族文化所特有的，如在中国，人们喜欢将老寿星送给年纪大的老人，以此表达对老人的长寿祝贺。若按此文化释义，将老寿星礼品送给德国老人，则不会得到受礼人的感谢，而是会使他们生气，因为在德国，老人忌讳年老的暗示和相关话语方式，老人互相问候时会避免“你高寿”等话语方式。在同中国同事交往中，中国人彼此间的客套形式和客套话语，如“我有空是会请您吃饭的！”，“有空请到家做客！”在德国人按字面意义直接理解，

²⁰ 姚介厚：《跨视角的文明交往观》，载《文汇报》，2011年5月23日，第11版。

²¹ Florence Gaub, „Die Südente will sich hinlegen. Wi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Strategievermittlung behindern kan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September/Oktober 2010, S.30-36.

将之当真时,会让德国人感到中国人不守信诺,或“被人愚弄”。这种基于本我文化理念和行为习惯也影响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德国和欧洲的发展²²,如不少中国企业家对欧洲文化,特别是法律和商业惯例缺乏了解,在同外资进行谈判时不乏按照自己习惯的谈判方式和对官方机构的对待方式和期待方式,如某公司在到异国投资时,按在中国已有的习惯,也要求当地“市政府”出面接见,出面搞定相关经济合作项目,殊不知,在像德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不能干涉经济生活。企业如何发展,与谁合作,政府通常不介入,企业自主决定。另外,“一些企业在并购或在德国当地建厂后,缺乏适宜的本土化战略,或者照搬国内模式,引发内部不和。”²³

这种跨文化互动认知方式也成为国与国彼此审视的方式,在这方面,国家之间的“对”与“错”一方面是基于本国立场审视他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国家特性/物自体属性的相距性决定的,相距性越大,“错”的判断可能性越大,相距性越小,“对”的可能性越多。²⁴由此可见,同一文化圈和文化价值、特别是具有相同政治价值的国家彼此更容易进行合作。在主观感知他国利益期待和立场背离本国利益期待时,一国会作出“错”的判断,在主观感知一国对外政策符合本国政治立场、利益期待时,会得出“对”的判断,在这方面主观感知的一国政策“错”和“对”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本我行为体’对‘他我行为体’进行跨文化互动认知的结果。基于这一认知,如,德国媒体对中国环境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德国自身特有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环保理念,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德国社会在经历了因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和生态遭受破坏后,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在此期间形成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同的“后工业化时代”和“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价值观,这种环保价值理念推进了德国社会对环境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在这方面,虽然中国也开始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保问题,但同德国相比,中国人的环保理念还有待提高。对中国环保的负面报道,只是在认知互动中出现的不对称性感知所产生的认知结果。另外,在文明间出现相反价值观时,人们更会有意或无意基于本我价值去对待他我文明和他我文化,在这种跨文化互动认知困境下,在价值观出现对峙时,“文明对对方产生的不是吸引力,而是反感,这就是文明冲突的起因。”²⁵

3 主观困境

跨文化理解的主观困境源于个人针对他我文化的主观文化立场和主观文化态度。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观文化立场和主观文化态度涉及长期以来本我文化针对他我文化的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²⁶在对他我文化负面看法上,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在程度和内容方面存在不同性。文化定势是一国文化成员在理念上对一民族和文化的定格思维方式,在对他我文化有负面心态时,文化定势会转化为文化偏见。当文化偏见还带有强势文化心态、文化优越感和个人情感对峙时,文化偏见易转化为文化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优越感和强势文化心态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在文化间出现不对称和不同性或出现对峙性价值时,人们会对他我文化进行主观恶意解释。²⁷在微观层面,跨文化理解主观困境涉及个人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它决定个人对宏观文化定势的接受程度、对他我文化的反应方式、跨文

²² 翰墨:《德国成为中资企业布局欧洲“战略高地”》、《中国投资需警醒“四大软肋”》,载《经济参考报》,2011年2月25日,第5版。

²³ 翰墨:《中国投资需警醒“四大软肋”》,载《经济参考报》,2011年2月25日,第5版。

²⁴ 王志强:《国际关系的关系性和跨文化性》,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第32-38页。

²⁵ 布范·钱德尔:《文明的不同范式》,载《文汇报》,2011年5月23日,第11版。

²⁶ Alexander Thomas, „Die Bedeutung von Vorurteil und Stereotyp im interkulturellen Handeln“, in *www.intercultural journal.com*, 2006/2, S.3-20.

²⁷ Wang Zhiqiang, „Das Fremdaufnehmen: epistemische Formen und epistemische Hypothese“, in Zhujian Hua / Rudolf Hoberg (Hrsg.), *Germanist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und Deutschunterricht in chinesisches-deutscher Perspektive*, Frankfurt am Main et.: Peter Lang Verlag, 2010, S.320-331.

化互动过程、跨文化感知和对他我文化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在跨文化理解偏离中立性和客观性时，个人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具有排他性，跨文化互动关系处于对峙性状态。在这一情况下，跨文化理解一切努力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在出现跨文化理解的主观困境时，在跨文化交往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文化成员不被尊重，并被置于不对等的沟通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跨文化交往平等地进行²⁸。强势的一方会要求交际对方接受本我文化价值，或强行推行本我核心价值、政治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西方人眼里，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是无法逾越的，并成为他们审视和理解他我文明的认知基本出发点。在国与国交往中，西方国家将本国/西方价值强加于非西方国家，期待非西方国家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制度和体制变迁，通过国家间的多层次关系，让非西方国家接受本国政治期待和政治立场，或通过互动有目的地改变对方，让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国家政治民主模式，成为西方国家同非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唯一的主观目的和行为出发点。“西方人把民主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²⁹，将“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敲打别人的榔头，“想以此摆平世界，实现自己政治、经济等战略利益的全球整合，”³⁰并以此建立盟友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接触与其说具有双向互动性，倒不如说是西方国家自我价值强行推行。这一西方对非西方的强势跨文化交流方式不会增进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在这种跨文化理解的主观困境下很难避免跨文化冲突。基于这一主观期待和主观目的理性，中国按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经济也让西方许多政治精英和西方国家置于跨文化理解的主观困境，西方以为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社会会更加积极靠拢西方价值和体系，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们所期待的体制和模式转化，在这一期待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进行抨击，由此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对中国多层面的负面报道和对中国发展的未来假设都是西方国家基于本我模式对中国解释的结果。³¹这种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方历史上形成的负面中国定势方式，如一百多年前德国出现的暗示中国威胁的“黄祸”定势在今天依然存在，并影响一些德国媒体对对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看法，如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前发表了题为“黄色间谍”的中国报道³²，延续着对中国的“黄祸”历史定势方式，由此表达了对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惧怕心态。从德国媒体涉华报道研究看³³，一方面德国本国利益成为德国媒体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德国媒体以自我视角去塑造中国形象，这种在主观视角下形成的中国形象不等于客观本源性中国，而是受到本国宏观国家利益、国家意识形态性和个人对对象国的主观态度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缺失了客观性。

三、如何摆脱跨文化困境？

面对跨文化认知特性所致的跨文化理解困境，本文在此提出几点思考：

客观层面，首先要研究各自文化的文化物自体特性，深度了解对象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提高对他我文化的文化敏锐度和敏锐意识，在此前提下可以较为客观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²⁸ Vgl. Hans Jürgen Heringe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2. Auflage, Tübingen: A. Francke Verlag, 2007, S. 22.

²⁹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 128-129 页。

³⁰ 同上。

³¹ 马丁·雅克：《跟中国做对，没有任何机会》，汪析译，载《环球时报》，2010 年 1 月 28 日，第 6 版。原文载美国《新闻周刊》，2010 年 1 月 25 日。

³² Jürgen Dahlkamp etc., „Die gelben Spione, wie China deutsche Technologie ausspäht“, in *Der Spiegel*, Nr. 35/27.8.07, S. 18-34.

³³ 王来：《德国〈时代〉周刊中的中国形象》，载戴启秀、王志强主编：《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国研究：德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72-286 页；张磊：《德国〈明镜〉周刊视角下的中国形象》，载戴启秀、王志强主编：《文化视角下的欧盟成员国研究：德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87-297 页。

在他我文化的背景下审视和理解他我文化。鉴于文化是动态的这一文化认知特性，人们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他我文化知识上，对已有的他我文化知识要不断更新和不断补充，使之反映已变化了他我文化。如果忽视文化动态性，那么，已有的他我文化知识和经历会转化为文化定势，并阻碍人们对他我文化个性化感知和了解。

互动认知层面，在跨文化沟通方面要引入双重维度的文化意识，即一方面在他我文化背景下感知和理解他我文化，从对方立场出发理解和解读其文化，以此避免基于本我文化的单一反向跨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为富有成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我们也应深入了解本我文化，通过他我文化界定本我文化，厘清本我文化同他我文化的不同之处，确定本我文化同他我文化间存在的矛盾和摩擦层面。同时，在跨文化交往过程中要充分认知差异性，以此拓展自身的认知范围，对原有针对本我和他我文化的“定型观念”进行修正，并通过这种文化互动认知方式，改变自我定型、自我对他我文化的定型，这方面要特别避免对他人动机的本我主观恶意假设，从他我文化自身特性出发，评价他我文化，这需要研究和了解各自文化物自体层面。

主观层面，人们要改变排他性主观文化态度和立场。由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文明观上的差异和文明多样性在所难免，文化间存在的不同性和不对称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相对于本我文化而存在的。在这一前提下，每一文化都有保留其特殊性的权利，“我们必须尊重由于传统、自然条件和现实国情等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价值和现代化道路选择，”³⁴尊重各民族文化特有的文化习惯，如宗教禁忌和文化行为禁忌³⁵，承认不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发展以及国家制度所致的多层次文化间和国家间不对称性。这要求人们客观对待文化本性，以平等方式对待他我文化，在此基础上方可避免主观文化态度所致的排他性跨文化审视方式和跨文化理解方式。

最后，在跨文化沟通中，除因文化时空和文化载体制约性所致的文化个性外，文化间也存在超越于文化的、为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和人类交往的行为方式。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超越于国家，超越于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为人类大多数人所认可，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共同特点，如正义、和平，宽容和同住同一地球意识等。在跨文化交往中人们要认同和恪守这一文化共性。在跨文化交往时，尊重文化共性也要求跨文化交流双方超越本我文化思维模式和文化审视习惯，以文化宽容心对待和尊重存在于文化间、国家间的多层次共性和差异性，以缓解跨文化冲突，促进人们的跨文化交流。

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 ——上海欧洲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综述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海欧洲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 60 多位会员参加了本届年会。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教授和副会长冯绍雷教授主持了会议。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与会学者们紧紧围绕欧洲债务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从欧盟与成员国两个层面对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成员国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欧债危机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热烈而富启发性的研讨，加深了对欧洲在国际转型中所面临巨大挑战和未来趋势的理解与把握。

³⁴ 王荣华：《“和合共生”是中国与世界的共同追求》，载《文汇报》，2010 年 11 月 7 日，第 6 版。

³⁵ Vgl. Hartmut Schröder, „Tabu“, in Alois Wierlacher et al.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Stuttgart/Weimar: J.B. Metzlerverlag, 2003, S.307-315.

一 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与影响

会议首先对欧盟经济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的丁纯教授指出, 2011 年欧洲经济具有四大特点。第一, 欧债危机深重、负面影响广泛, 致使金融系统脆弱、高失业率和紧缩政策进而导致需求疲软、政治僵局及决策机制瘫痪。第二, 银行及金融业的危机成为主要威胁。核心区国家与外围国家金融争利, 侵蚀到银行体系, 而银行体系脆弱又影响到经济。法国坚持希腊债务减记不能过多的主要原因即考虑到其自身银行体系的安全。第三, 双速经济现象日渐明显。双速欧洲一向存在, 对是否存在双速进行讨论是一个伪命题, 目前的状况是这种双速差距变大。第四, 经济治理倒逼前行, 没有摆脱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由于治理措施的协调过程充满博弈, 2011 年 10 月与 12 月的两次欧盟峰会都没有取得治理上的主动权, 目前为止始终是在补漏洞。欧盟面临死亡增长、严重失业的长期问题。他认为, 2012 年欧洲经济可能发生先抑后扬的情况, 因为欧洲的经济金融改革已经有所进展、相关成果将逐渐显现, 其前景将主要取决于美国、新兴经济体及欧元区的公共政策决策。

对欧债危机的原因与治理措施, 丁纯教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 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 一是欧洲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经济上的优化组合, 二是欧元区国家没有达到实现单一货币所需的要素完全流动的最优通货区的要求, 三是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硬伤。丁纯教授指出, 欧债危机的主要治理措施包括, 一是短期的“急救”, 目前最为急迫的是强化救助机制、稳定金融市场、夯实银行体系、完善货币联盟的治理机制, 二是中期的“固本”, 主要着眼点是深化财政协调和金融监管, 加强财政联盟治理, 三是长期的“强身”, 即提高竞争力, 促进经济的灵巧、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缩小结构性差距, 促进经济联盟的治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忻华副教授从希腊国内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特性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形成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 任何一国的经济演化都会在内外多种结构性因素和偶然扰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逐渐进入特定的轨道, 即所谓“路径依赖”。这种路径的选择, 可能含有随机的成分, 但一旦经济演化与其外部结构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 即所谓“锁定”, 就会进入不可逆、乃至不可偏转的加速运动。希腊在冷战时代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其经济出现了外向型、市场化、全球化的“路径依赖”, 但因其人口结构所限, 而无法走上出口导向型的道路。此后, 希腊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借助欧盟的内部整合政策和内部援助体制, 实现了高负债与高赤字背景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使其对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路径依赖”, 进入了“锁定”的状态, 结果希腊国内经济形成了高福利与低税收并存、低储蓄与低投资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接近刚性的高失业率三大特点, 使其高负债、高赤字进入不可逆的加速运动状态, 最终导致外债膨胀而引发危机。

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戴启秀教授认为, 欧债危机引发了欧洲经济和政治层面深层次治理问题和制度困境, 也是对欧洲迄今为止通过制度性建设推进欧洲一体化方法的一次重大挑战, 其核心问题是欧债危机将导致欧洲的分裂和解体还是将促进欧洲一体化。面对欧债问题, 需要从欧盟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欧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解决进程和在此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观察解决过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大陆后现代发展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的制度性较量, 欧洲应该能够延续欧洲一体化发展历程的传统思路, 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把握未来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和方向。第一, 欧洲一体化的危机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动力。从德国、法国等西欧主要国家的战略考量、外交定位来看, 强化欧洲合作和推进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对欧洲政策都是这些国家的战略核心之一, 也是其外交政策的主体支柱。因为, 对内, 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各国和平、安全和公正的保证。对外, 统一的欧洲更是与美国、俄罗斯和新兴大国进行竞争的必然选择。第二, 欧洲一体化发展基于政治家具有的敏感欧洲历史意识。欧洲政治家都有着敏感的欧洲历史意识。他们都认识到, 今天的欧洲就是从痛苦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的结果。历史不容许倒退, 倒退意味着战争。很难用经济学数据

和图表能够说明,更难用危机理论来诠释目前的欧洲。欧盟治理模式的制度建制是欧盟成员国间“平权合作”(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整合扩大”(超国家层面)这种双重治理的一体化模式。这一政治制度二元逻辑特质也构成了一体化特殊之处,其内在的推动力来源于其结构,同时,矛盾和冲突也来源于此结构。第三,欧债危机为欧盟带来制度创新。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的挑战和为欧债危机的解决,欧盟在制度层面推出三个方面的主要举措:欧盟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限的财政联盟进而甚至建立经济政府,进行欧盟层面的制度性改革、修订欧盟制度框架《里斯本条约》。

丁纯教授指出,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已通过多渠道向全球扩散。第一,欧盟的经济衰退通过贸易与投资渠道影响全球各大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方面,美、中、俄等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受到冲击。2010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了31.8%,而2011年1~11月份同比仅增长17.4%。在国际投资方面,欧盟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即流出的投资资金)总额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即流入的投资资金)总额分别由2009年的2810亿欧元和2160亿欧元锐减到1070亿欧元和540亿欧元,跌幅分别高达62%和75%。第二,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地位下降、欧债投资者面临损失、国际资金流向发生改变、欧洲资产流动性下降等状况,加大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

同济大学的王义桅教授从战略层面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影响,认为欧债危机是以一些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折射的欧盟一体化危机,由于发生在欧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其溢出效应被放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洲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国际比较优势萎缩的结果,是其生产方式无法维继民众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最理想的解决结果也只能以财政联盟挽救欧盟作为多极化世界一极的命运。从现实表现看,欧债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格局走向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加大了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矛盾、英国与欧元区国家矛盾、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元区与世界经济矛盾,使欧盟未来数年内忙于做内部功课而非热衷于全球治理,倾向于走务实的地缘经济而非价值观路线,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硬、软实力。然而,欧盟正借助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其成效将舒缓而不能化解欧盟的战略颓势,增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国应抓住战略机遇,通过地缘经济手段增强我对欧战略影响,确定以对欧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德关系为主轴、以地区支点国家为依托、以问题国家为突破口的对欧外交新思路,改变以欧盟机构为重心、纠缠于老问题的传统对欧外交格局。

二 成员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

同济大学的郑春荣教授对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的表现进行了介绍并主要从其内政因素的角度进行了重点分析。欧债危机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或者违背德国的意愿,将无法得以解决。但是在欧债危机发生之时,德国从主观上并没有做好牵头解决欧债危机的准备、没有解决问题的现成办法,默克尔政府更被认为是在采取拖延战术从而增加了救助成本,所以引发了外界对其危机中的外交政策与欧洲政策的不满。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欧债危机亦是德国自身的危机。起初,德国在救助希腊问题上比较沉默,认为这首先是希腊自己的事情,并不情愿施以援手。随着希腊危机和欧元危机进一步的恶化,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德国开始利用自身力量,开展某种类似于单边的行动,让其他国家遵守德国规则,效仿德国模式,以帮助走出危机。整肃财经纪律是德国在危机应对中行为模式的核心,具体表现包括:按德国的条款和条件给予希腊救助;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危机解救;要求私人债权人参与危机解救,有关银行进行债务减记;在不改变欧洲中央银行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同意有限扩大欧元救助基金;引入债务刹车器以及自动惩罚机制;哪怕以“双速欧洲”为代价也要修改条约。此时,法德轴心虽然犹存,但重心朝着德国推移。法德解决危机的理念不同,而最终是德国的立场得到了贯彻。德国依然是“欧洲的德国”,但是在

个“打上德国烙印的欧洲”中，德国在其中有意识地谋求领导权，而这引起了邻国对“新德国问题”的警觉。

郑春荣教授指出，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内因素的牵制，日益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中心制定对外政策，我们对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的种种表现可从其内政角度挖掘原因。第一，多数德国人反对救助希腊以及扩大对希腊的救助，反对对希腊债务减记。多数德国人认为欧元给德国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利。民调显示，不仅仅多数德国人对于欧元的印象负面，而且有一部分政治精英也有同样观感。默克尔虽然意识到，德国作为出口大国，从欧元区中获益颇多，并且德国银行亦被深入整合进欧元区，但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她在公开场合却很少作出相应解释。此外，德国工会方面批评政府没有与民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导致民众无法认识到欧元的重要性，推行相关政策阻力颇大。第二，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稳定已成为德国民众首要关注的议题，远远领先于失业、经济状况、教育与养老金等议题，这也影响到德国不同政党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基民盟的立场是不希望希腊破产，拒绝把希腊踢出欧元区，同时基于宪法的规定反对引入欧元债券。但是这个立场受到部分党内人士的批评。基社盟、自民党成为执政联盟中欧洲政策上的干扰因素，尤其是处在危机中的自民党寄望于反欧与疑欧言论突出自身形象、拉拢部分选民。社民党、绿党等基本上对欧元债券持支持态度，将该议题成为反对党的先占议题，从而给现政府的政策制定制造麻烦。

华东师范大学的潘兴明教授对英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1年12月明确表示不同意签署加入新的财政公约，英国对欧盟的集体行动再次表现出了强烈的暧昧甚至背离态度。这种态度虽然使卡梅伦受到了欧洲同伴的谴责，但却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好评。卡梅伦的行为反映了英国对欧盟的固有立场，即一是在不损害英国利益的前提下支持欧盟的决议，二是英国在欧盟属于例外，三是英国没有也不准备全面融入欧洲一体化，四是英国对法德在欧盟的领导权不提出挑战，但会避免法德影响力过大。英国的立场与其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密切相关。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国内的疑欧主义一直十分强大，其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英国对把国境管理权交给意大利此类国家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仍然会相对紧密，其不会退出欧盟。第二，英国会继续游离于核心欧洲之外，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持消极立场。第三，英国保守党的疑欧主张与行为会对其内政产生反作用，不利于联合政府的稳定。

三 欧债危机的前景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关于欧债危机的前景及其给欧洲发展带来的挑战，与会学者讨论热烈，观点也有所不同。有学者对欧债危机的解决前景表示悲观。由于欧洲各国在利益上缺乏共识，制度安排上无法做出有效决定，目前在恢复市场对债务国债务偿付能力的信心这个根本问题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信心是欧债危机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该问题，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危机的希望十分渺茫。有学者对欧债危机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欧洲在全球层面缺乏有效竞争力，根本问题是欧盟内大小国家经济实力不对称。面对危机，政治意愿是解决危机的关键，法德领导人应该能够达成妥协使联盟利益超越民族利益，进而实现欧盟发展的长远战略。目前，中东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包括欧元的支持较为坚定。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欧盟的创新力，特别是体现在治理领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区域。欧盟总能在面对危机时找到制度创新的办法。此次危机即使造成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欧元区缩小，而一个实现有效财政联盟的小欧元区反而是一种更激进的一体化。面对全球范围内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现实压力，欧洲没有道理放弃已有的一体化成果。也有学者认为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的对华立场会更加现实和理性。虽然中欧间认识世界观的角度可能不一样，欧洲也有一些遏制中国发

展的声音,但不一定会发生价值观冲突。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加积极了。

结合讨论的问题,与会学者还对国内欧洲研究的方向与重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专家对 2012 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的法国社会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如果社会党选举获胜上台,将会推行与现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不同的欧洲政策。欧洲的政治特点是选举政治,每个国家的政党和领袖都有不同的政治色彩和风格,其上台后对整个欧盟的发展与政策也都有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重视对欧洲政党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德法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英法在对利比亚危机的干预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各个方面看,成员国在欧盟中的地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陈乐民教授一代的学者已经提出过加强对欧盟成员国研究的问题。我们对欧研究确实应在一定程度上要向成员国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是在三十年欧洲研究的已有基础上开展更好的欧洲研究,是将欧盟与成员国结合起来的统筹研究。还有学者指出,欧洲研究不能只做欧洲本身或仅仅包括中欧关系的研究,只有放开眼界,将欧洲一体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化进行比较,将中欧关系与中美、中俄、欧美、欧俄等关系结合起来看,才能对欧洲发展、中欧关系作出更准确的研判。

会长戴炳然教授对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近几年,国际局势动荡,中美关系、周边关系表现得非常复杂,而中欧关系则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后,欧洲一下子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我决策部门对欧债危机的发展情况也很重视。欧债危机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一定是坏事,需要的是我们能抓住其中蕴藏的机遇。目前来看,国际体系正在转型,在这期间加强对欧盟力量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尤其需要加强对欧盟成员国的研究。欧债危机,既是钱的问题,但又远非钱的问题,是市场信心问题,也是整合资源的能力问题。欧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的,其缺陷是必然的,其发展也缺乏长远战略。欧洲今后的发展趋势,从中国、美国、欧洲自己的不同立场与角度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需要我们研究人员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提出有见地的看法。

(作者简介:杨海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欧洲学会咨询部副主任)

简讯

* 1月9日下午,学会召开首届顾问会议,名誉会长伍贻康、会长戴炳然、顾问潘光、唐振琪、邓恩等出席了会议,曹子衡秘书长汇报了学会近期工作和今后的工作重点与设想。与会顾问们对学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学会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陈志敏、潘忠岐、忻华参加了会后关于欧洲金融危机问题的交流讨论。

欧洲动态 (2012年1月1日—2012年1月31日)

中欧关系

➤ 中新社 1月16日,“中欧文化对话年”新闻发布会 16日在中国文化部举行,这是 2010年10月第十三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为推动中欧关系全面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 2012年间将有 150余项目在欧盟 27个成员国轮流上演开展,项目涵盖哲学、艺术、文学、语言、新闻出版、青年交流、旅游等各个领域。

➤ 法国中文网 1月16日,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猫“圆仔”和“欢欢”15日乘专机抵达法国,开始它们在这里为期 10年的中法大熊猫繁育合作计划。

➤ 中新社 1 月 24 日, 在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英国首相卡梅伦等政要纷纷发表贺辞, 向在英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致以节日祝贺。卡梅伦表示, 今年将庆祝英中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40 周年。他希望这个龙年能给中国、英国和每一个人都带来成功。

欧洲政治外交

欧盟

➤ 和讯网 1 月 3 日, 在 2012 年 1 月 1 日欧元货币流通十周年之际, 法国央行行长诺亚日前在法国《星期日报》上撰文称, 如果欧元区成员国加快解决危机, 欧元有望在十年后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诺亚称欧元取得了“显著成就”, 并称法国出现的问题与欧元无关。

➤ 中新社 1 月 10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 9 日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两国首脑商讨了有关金融交易税问题及希腊局势。在新闻发布会上萨科齐强调, 2012 年是各国消除赤字决定性的一年, 德法合作非常重要: “如果德国和法国不能保持一致, 欧洲将没有前途”。

➤ 欧洲时报 1 月 18 日, 欧洲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来自德国的资深议员舒尔茨 17 日当选欧洲议会新一任议长, 并誓言要有所作为, 为欧洲议会争取更多话语权。舒尔茨生于 1955 年, 1987 年至 1998 年担任德国维尔瑟伦市市长, 1994 年起担任欧洲议会议员, 2009 年当选欧洲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

➤ 欧洲时报 1 月 19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18 日在欧洲议会呼吁成员国尽快落实去年 10 月达成的“稳定与增长五点路线图”(包括结构改革、加强欧盟竞争力、加深内部市场一体化、加大创新投资, 以及尽可能多地开拓欧盟以外的市场等), 以应对危机并实现经济增长。

➤ 新华网 1 月 31 日, 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 30 日在会晤参加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欧盟及其各成员国领导人时表示, 欧洲议会建议按 0.05% 的税率征收金融交易税, 舒尔茨说: “征收金融交易税有利于抑制投机, 有益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舒尔茨还呼吁欧盟发行欧元债券。

英国

➤ BBC 1 月 5 日,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 50 年来的首次访问缅甸。威廉黑格表示: 他的访问是为了促进缅甸政府继续改革的道路。并评估英国在这个进程中能做出何种支持。他希望缅甸新政府能释放更多的政治犯。

➤ 中新社 1 月 14 日,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 13 日访问沙特阿拉伯, 与国王阿卜杜拉及王储兼内政部长纳伊夫举行了会谈, 议题包括全球经济、能源安全以及反恐等。沙特官员称, 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英国向沙特出口新技术及武器的问题。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地区最大贸易伙伴, 每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150 亿英镑, 沙特在英国的投资高达 620 亿英镑。英、沙两国在能源、商业、安全等领域正谋求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欧洲时报 1 月 27 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 26 日在达沃斯年会特别发言中表示, 所有成功的单一货币都具有相同特点, 需要完善、成熟的制度作为支持, 这包括强势的统一中央银行、健全的金融制度、高度一体化并能灵活应对冲击的经济、能够化解内部不平衡和风险的财政转移制度以及共同的发债机制。卡梅伦说: “欧元区的问题不是缺乏其中某项制度, 而是根本一项也没有。”卡梅伦表示, 欧洲单一货币——欧元不具备关键制度的支持, 没有

可持续性。鉴于目前欧元区各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卡梅伦认为，差异极易造成区内不同经济体之间财政和贸易的不平衡，债务危机是这种不平衡的集中爆发。

法国

➤ 法国中文网 1 月 3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其首届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新年讲话时，声明其任期最后几个月的工作重点将把就业问题放在首位（法国的失业人数不断上升，11 月升至 280 万，创下 12 年来的纪录）。

➤ 法国中文网 1 月 4 日，法国政府 1 月 3 日表示，将借鉴德国的做法，通过上调增值税税率提升法国产品竞争力，并为法国社会福利系统融资。目前法国的增值税税率最高为 19.6%。

➤ 香港中通社 1 月 27 日，萨科齐 26 日接见了来访的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双方就两国关系及科民族和解等话题交换了意见，并随后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卫与安全协议。

➤ 欧洲时报 1 月 27 日，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 26 日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我们的国家需要改变。”他表示他的竞选纲领基于 4 个原则：“清醒、毅力、公正以及明晰”。随后列出了他竞选纲领的 60 条承诺，包括税务方面的深度改革、支持中小企业的措施以及支持教育事业和扶持年轻人的提议。

➤ 中新社 1 月 28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27 日在巴黎会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就阿富汗局势和法国对阿援助等议题进行讨论。双方还在会谈后签署了一份两国友好合作协议。萨科齐在会后宣布，将加快撤出在阿富汗的法国驻军，撤军的最后期限从 2014 年底提前至 2013 年底。有分析认为，萨科齐在距离总统大选不到 3 个月之际终于决定提前撤军，从此在阿富汗问题上向其竞选对手的政策主张靠拢。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认为，法国在阿富汗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在 2012 年底前撤军。

德国

➤ 新浪财经 1 月 2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 1 月 1 日在新年电视致辞中称，她预计 2012 年仍会出现市场动荡，但她将尽“一切可能”拯救欧元，结束欧洲债务危机。

➤ BBC 1 月 4 日，德国国家元首伍尔夫 4 日晚间为自己在涉及其财务交易一事中犯下的“重大错误”公开道歉。伍尔夫 2008 年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从一个商人的妻子那里获得了一大笔低息贷款用于购房。此事可能会让伍尔夫成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包袱，但他拒绝接受辞去德国联邦总统职位的要求。

➤ 新华网 1 月 26 日，德国青年、家庭和卫生事务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施罗德 24 日宣布成立新机构，承诺为地方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地方政府应对新纳粹主义的蔓延。

其他国家

➤ 国际在线 1 月 2 日，丹麦 1 日起正式接替波兰出任 2012 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当晚在 2012 年新年致辞中说，丹麦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领导欧盟，这是一项艰巨任务。丹麦会努力解决面临的问题，并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为欧洲向前发展做出努力。

➤ 中新社 1 月 4 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 月 2 日宣布，丹麦将军孔德·巴特尔斯接替意大利海军上将迪保拉，正式就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自 1963 年设立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来，丹麦军人首次就任该职。

➤ 中新网 1 月 8 日, 据俄新网报道, 希腊外交部长斯塔夫罗斯·迪马斯 7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腊不会因宏观经济形势的困难而退出欧洲货币联盟。

➤ 欧洲时报 1 月 30 日, 据 BBC 报道,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部门说, 到 2011 年 12 月底, 西班牙有 530 万人失业, 失业率达到 22.8%, 达到近十七年最高。西班牙在欧元区 17 国中失业率最高, 在全球工业国里居冠。预计会重新陷入经济衰退。

欧洲经济

欧债危机

➤ 新华网 1 月 14 日, 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 13 日发表声明宣布了对除希腊以外的所有 16 个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估结果。其中, 法国和奥地利丧失了最高的 3A 评级, 被下调一个等级至 AA+;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均被下调了两个级别。标普称, 欧元区目前所出台的政策仍不足以遏制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 欧洲时报 1 月 19 日, 德国在连续 2 年的高增长后, 经济增长幅度 2012 年将放缓。德国经济部长勒斯勒尔 18 日在政府《年度经济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由于外部环境更加困难, 德国经济冬季将处于增长低谷, 预计 2012 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仅为 0.1%, 但随后有望重拾较高增长。2012 年德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 0.7%, 但 2013 年增长率将达到 1.6%。

➤ 新华网 1 月 24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与意大利总理蒙蒂在扩大欧洲稳定机制规模上立场相近。蒙蒂提出必须将欧洲稳定机制由计划的 5000 亿欧元放贷规模扩容至 1 万亿欧元, 以恢复投资者对南欧国家债券的信心。德国总理默克尔 23 日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意大利等提出的扩大欧洲稳定机制规模的要求。

➤ 欧洲时报 1 月 28 日, 惠誉评级公司 27 日宣布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个级别至 A-, 将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从 AA- 下调两个级别至 A。此外, 惠誉还分别调降了比利时、塞浦路斯以及斯洛文尼亚的主权信用评级, 同时维持爱尔兰的评级在 BBB+ 不变。惠誉还宣布将以上六国的评级前景均定为“负面”。惠誉警告欧元区持续的债务危机将进一步危害这些国家的融资能力。

➤ 新华网 1 月 30 日、国际在线 1 月 31 日,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30 日晚在布鲁塞尔召开今年首次峰会。会上, 欧盟 27 国领导人一致通过了“欧洲稳定机制”, 并授权欧元区各国财长在下一轮财长会议上签字, 以便从今年 7 月 12 日起运作, 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但在基金扩容上仍有分歧。此外, 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欧盟 25 国通过了旨在加强财政纪律的“财政契约”草案。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除了英国和捷克外, 其它 25 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而一旦获得 12 个成员国批准, 条约就将生效。欧元区国家随后发表集体声明说, 这意味着欧元区朝向更紧密的财经一体化与更有力的经济治理迈出了重要一步, 同时也为解决欧债危机、改善经济增长和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带来了更好的前景。本次峰会的中心议题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各国领导人在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为创造就业, 尤其是青年人就业, 欧盟将做以下事情: 第一、对失业率特别高的成员国, 欧盟将用现有的基金为青年人创造岗位和进行培训; 第二、将用欧盟结构基金的资金来鼓励青年人创业; 第三、修改欧盟规则, 增强流动性, 创造更多跨国就

业机会。成员国政府承诺：第一、鼓励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大量增加学徒和培训性质的工作机会；第三、对肄业生进行工作培训；第四、为青年人提供到第三国发展的机会。本次峰会，欧盟还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

➤ 中新网 1 月 31 日，据外媒 31 日报道，法国一直是推动金融交易税的“急先锋”，在其他成员国未就此达成一致前，率先征税。法国总统萨科齐 29 日宣布自今年 8 月开始征收税率为 0.1% 的金融交易税。此举遭到了国内金融银行业的大力反对。但在全球范围内对此事严重缺乏共识。多数欧盟成员国反对法国单独开征金融交易税，英国更是开征金融交易税的坚定反对者。法国银行协会发表声明表示：“法国单方面征收交易税将拖累国内成长，导致竞争力流失，严重阻碍法国经济的融资。”英国首相卡梅伦 26 日批评，泛欧交易税是疯狂的，并直指这将削减 50 万个工作机会。

➤ 国际在线 1 月 31 日，法国总理菲永 30 日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环境恶化，法国政府将 2012 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5 个百分点至 0.5%，这一修改将意味着政府公共账户减少约 50 亿欧元收入。

国际综合

中东北非问题

伊朗

➤ 路透社 1 月 4 日、中新网 1 月 5 日，欧盟外交官 4 日称，欧洲政府 4 日就禁止进口伊朗石油达成原则性共识。伊朗每日出口约 260 万桶石油。欧盟国家每天购买约 45 万桶伊朗石油，是伊朗原油第二大出口对象。欧盟可能对伊朗石油实施禁运，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年前夕将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签署立法，结成了打击伊朗核计划的西方阵营。

➤ 中新网 1 月 6 日，伊朗海军为期 10 天的代号为“守卫 90”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3 日结束。演习从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向东越过阿曼湾，直至亚丁湾和印度洋北部公海，演习区域跨越 2000 多公里。伊朗在此次演习中测试了多种型号的国产导弹。有分析认为，伊朗军演证明，其具有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 新华网 1 月 14 日，英国首相卡梅伦 13 日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就伊朗等问题举行会谈。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此前表示，已做好准备填补伊朗因遭制裁而产生的石油供给缺口。

➤ 中新网 1 月 15 日，据外媒报道，英国外长威廉黑格 15 日警告，伊朗核问题可能引发中东军备竞赛，国际社会应该对任何能解决这一威胁的方法加以考虑。此外，黑格呼吁伊朗与西方进行谈判，否则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

➤ 中新社 1 月 24 日，欧盟外长会议 23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通过了针对伊朗核问题的石油禁运令。从即日起，欧盟将不再与伊朗签署新的石油合同，已经生效的石油合同被“宽限”执行至 7 月 1 日。

➤ 欧洲时报 1 月 30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支高级别代表团 29 日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讨论伊朗核计划中的争议问题。

➤ 新华网 1 月 30 日，欧盟领导人 3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一致批准欧盟外长会 23 日作出的对伊朗和叙利亚实施制裁的决定。同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对叙利亚局势作出反应，以期立即制止暴力。

➤ 国际在线 1 月 31 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30 日在峰会结束后发表声明，呼吁伊朗政府立即停止“敏感核活动”，全面遵守相关国际规则与义务。声明说，欧盟与伊朗进行“严肃、有意义”谈判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欧盟将继续努力寻求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声明重申，欧盟对伊朗在能源、贸易、金融领域采取的制裁措施不针对伊朗人民。

叙利亚

➤ 中新网 1 月 4 日，据外媒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 3 日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并指责他领导了对叙利亚人民实施的“令人作呕的大屠杀”。萨科齐还表示叙利亚人民应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

➤ 中新网 1 月 5 日，据外媒报道，叙利亚 4 日谴责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称美国国务院前一天就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在叙利亚视察情况发表的声明是“公然的干涉”。美国国务院 3 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对叙利亚政府未能完全履行对阿盟作出的承诺感到担忧。虽然阿盟观察团正在叙实地考察，但这个国家的暴力仍在持续，而且政府未遵守承诺释放所有政治犯。

➤ 中新网 1 月 13 日，因在叙利亚的观察任务遭遇困境，阿拉伯联盟(阿盟)决定推迟增派观察人员。阿盟观察团不久前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遇袭，11 名阿盟观察员受伤，阿盟观察团于去年 12 月 26 日抵达叙利亚。由 165 名安全和人权领域专家组成。

➤ 中新网 1 月 18 日，据外媒 18 日报道，叙利亚外交部 18 日发表声明，拒绝阿盟向叙利亚派兵。叙利亚外长称：“叙利亚拒绝卡塔尔要求派兵的官方声明。阿盟派兵进驻叙利亚只会让局势恶化，陷入外国势力干涉的困局。”“叙利亚人民拒绝任何名义的国外势力干涉，反对破坏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 中新网 1 月 31 日，综合报道，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31 日表示，叙利亚霍姆斯地区 30 日暴力冲突升级，共造成 96 人死亡，其中包括 55 名平民。同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近郊爆发激烈战斗，政府军重新控制了大马士革东部郊区。

➤ 中新网 1 月 31 日，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天援引叙外交部的声明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政府的指责以一种诽谤性的方式出现升级，其言论具有侵略性。”30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即将开会讨论叙利亚局势之际，美国以“最强烈”言辞谴责叙利亚政府，声称安理会对此必须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一份声明中称，最近数天叙利亚安全部队加紧行动，造成数百平民死亡，美国“以最强烈言辞谴责叙利亚政权升级对本国人民的暴力野蛮攻击”。与此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也表示，欧洲对“叙利亚政府的镇压行为表示愤慨”。